

对太监眼不见为净，他掣掉自家乌纱帽

苏州人伍袁萃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出任广东按察使司副使。

按察司属于“垂直领导”，负责纠察各省府、州、县的司法刑狱、查办不法官员、协理地方兵备等事宜。

廉州府当时属广东管辖，出产的珍珠在历朝历代都是贡品。不知道是否跟姓“朱”有关——纯粹是我个人瞎猜，明朝皇帝大多是“爱珠人士”。

朱元璋在位时就在合浦修筑白龙珍珠城，派驻守军负责边海防的同时监守珠池。到了明英宗时期，专门派遣太监驻守，负责采珠事宜。

但伍袁萃却与太监“闹不团结”。《廉州府志》记载伍袁萃“耻见内官，疏去兼管珠池之事”。他讨厌太监，眼不见为净，于是打报告申请不再过问与珠池相关的事情。

按察使派兵守卫珠池，是“奉制”而行；太监驻守珠池，则是“奉皇命”。双方都是钦差，伍袁萃与太监闹得水火不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合浦珍珠城位于现在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白龙村委会，就在历史上著名的“七大珠池”之一的白龙池边上。

珍珠城规模宏大，城周长二百三十多丈，城墙高一丈八尺，筑有东西南三个城楼，其南城遗址至今还在。

当时驻守珍珠城的太监名叫李敬。现在白龙城还有一块为他立的“李爷德政碑”。

过去为了铭记官员在任期间所做的好事，人们在其离任后铭碑勒石，表达对其恩德的感念。碑的名称不一，有的叫“德政碑”，有的叫“去思碑”，还有的叫“遗爱碑”。

铭碑最早可能是吏民士绅的自发之举，但后来越来越泛滥，反“客”为“主”，本来是地方绅民用它来表达感谢，后变成了地方官拿它为自己脸上贴金。

唐朝曾任广州都督的贤相宋璟为此专门上奏唐玄宗，请求从自己开始，革除立“功德碑”这种谄谀风气。

但拍马屁通常是“两情相悦”的，拍的人乐意，被拍的人开心。明朝由于种种原因，立德政碑的风气愈加浓厚，后来发展成不只是立碑，还要修亭、建阁、筑生祠。

在这种风气之下，德政碑的含金量已成了孔乙己的茴香豆，“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

白龙珍珠城的“李爷德政碑”因年代久远，也可能是粗制滥造，文字已经模糊不清，难以分辨记了传主什么德政，立石刻碑还不及纸上写字。

史书中关于李敬的记载，却没什么可“敬”之处。

李敬在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被派驻廉州监守珠池，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年）奉召回京。《明史》载，李敬与另一名恶太监李凤不和，“敬恶亦不减于凤，采珠七八年，岁得珠近万两”。

“往时中官莅合浦，巧征横索如豺虎。”（明顾梦圭）采珠一向是当地的民生浩劫，不仅需要大量征集船只，派役抓夫，还要特别加征采珠税供开支，采一次珠，等于揭当地民众一层皮，沉船死人无数。嘉靖年间进谏罢珠的广东巡抚林富斥之为“以人易珠”。

李敬在白龙城驻守十一年，他回京师时，“五月，进大珠一颗重九分，一颗重七分三厘，一

颖重一分二厘；中珠一千一百一十两。六月，李敬进珠五百二十七两一钱”。

“岁得珠近万两”的他奇货可居，取悦皇帝以邀宠，如此采珠劳民伤财，给地方百姓带来了多少苦难，可想而知。

“李爷德政碑”最大的可能是李敬自立。他自己多年滥采，酿成了珠民造反的大祸，“珠池盗起，敬乃请罢采”。他卷起铺盖回京时，为辞其咎，做了个顺水人情，上书请求停采，却成了一桩功德，他便叫人凿石以纪。

这位李爷不是什么好人还有一个证据：《廉州府志》中收录有不少关于合浦官员德政的碑文，如关于任上鞠躬尽瘁的知府黄文豪的“廉山堕泪碑”，关于廉洁守身的合浦知县胡济世的“合浦令胡侯去思碑”，关于上任仅三个月就离职的知府王如瓚的“郡守星冈王公遗爱碑”……

但偏偏身为钦差的李敬的这篇碑文只字不见，岂非吊诡！

伍袁萃任广东按察副使的时间，正好与李敬“同框”（同期）。

史书记载，李敬的一位随从“擅杀人”。按理这种事属于地方官知府的分内之责，不知道是不敢管还是不想管，案件到了督察司法办案的伍袁萃手里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伍袁萃“捕论如法”，派人把李敬的手下抓了起来，依法判处了死刑。

李敬大失面子，与伍袁萃成了“有我没你”的冤家，他倒打一耙向都察院诬告伍袁萃，朝廷派出了调查组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伍袁萃提出了自己不再兼管珠池，后来“遂请求归”，负气摘下乌纱帽回了老家。

性格即命运。伍袁萃尚气任性是其一贯的做派。别说是得罪珠池太监，对烜赫一时的权臣，他也是“目中无人”。

伍袁萃任“国防部处长”（兵部员外郎）时，位居三公的名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楨，四处活动想当锦衣卫指挥使，伍袁萃多方阻止，生生将其“如意算盘”给打乱了。

伍袁萃在担任“浙江省副总督学”（提学僉事）时，下去检查发现，有几十人冒名在府学就读，他根本不管这些人什么来头和路数，全部予以斥逐。

撺掉乌纱帽回家的伍袁萃并没有闲着，一心著书立说。古人把当官告老还乡称为“林下之居”，他写过一本《林居漫录》，痛斥朝廷的各种弊端痼疾。

书中“大肆抨击”官场腐败，指责府、州、县贪者过半，引用了当时的广东民谣：“广州太守忙十万，潮州太守坐十万，琼州太守眠十万”；直斥“今之武官，不独惜死，抑且爱钱……盖势不得不爱也”，因为都是“以上剥下”，下面一级级要进贡，朝廷的钱便落到了各级文武百官手里。

书中对言路不开、考试不公、执法偏袒、欺上瞒下等种种负面现象也多有曝光。

这本书因为“多贬斥当世公卿大夫”，太过缺乏“正能量”，被认为“词气过激……不免矫枉过正”，到了清朝还被列为禁书。

伍袁萃如此大义凛然，愤世嫉俗，严于责人，正因打铁还需靠自身硬，他自己的确是清官一枚。

明朝送礼风气浓厚。史书记载，伍袁萃所在的万历年间，除夕前南京兵马司衙门前队伍浩荡，

道路阻塞，人人手捧食盒，原因是“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”。

就是在这种“大臣志在禄位金钱，百官专务钻营阿谀”的风气下，伍袁萃“守己清白，不设币帛贄交之仪”，坚持清白为官，不搞迎新送旧、逢年过节送礼那一套。

公认“执法严正，不避贵幸”的伍袁萃，作书为文却被认为“词气过激”，但他说到做到，责人先律己，不愧为言行一致的清廉刚正之士。